
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

习五一

中国传统宗教与近代西方宗教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华夏宗教文化的庙会传统源远流长。从古至今,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,一直吸引着千百万民众的热忱参与。庙会文化的发展与变异,不仅渗透着宗教信仰与传播方式的嬗变,而且反映出社会风俗与民众心理的变迁。本文主要考察近代北京民众宗教文化与社会风俗演变的轨迹。

近代北京的庙会文化,在都市社会缓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,总体规模趋向衰落。其多元功能的互动关系不断调整,各种功能的内涵逐渐演变。宗教的主导作用发生根本动摇,商贸与文娱功能日益增强。地处繁华闹市的庙会,商业贸易功能迅速超过宗教的魅力。民众云集的庙会集市,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,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然舞台。

一、京城庙会的衰落趋势

燕京地区的庙会习俗,有文献可考的历史,上溯到辽金。自元朝定都后,历经明清,道教佛教寺庙遍及京城内外。各种庙会繁华昌盛,异彩纷呈。

进入本世纪,古都北京由封建帝都走向现代化大都市。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,中国传统宗教文化,日趋衰落。整个民国时期,北京城郊除 1924 年兴建的莲花山蟠桃宫外,佛教道教界都无力兴建新的坛观寺庙。作为世界著名的古都北京,在二三十年代,尚残存历朝兴建的坛观寺庙约千余座,为全国城市之冠。但大半已逐渐颓废荒芜,香火依稀。

政治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最重要的因素。其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最为鲜明。清朝帝制崩溃后,与清王朝密切相关的宗教祭祀,随之停止。皇家祭祀的庙宇失去昔日的尊贵辉煌。天坛、朝日坛、夕月坛等日渐颓废,殿堂倾圮,杂草丛生。地坛、社稷坛、先农坛、先蚕坛、清太庙、帝王庙等相继辟为大众公园或兴办文教事业。

随着清朝帝王祭祀的辍废,封建统治者倡导推崇的关帝庙、文昌庙等也逐渐门庭冷落,香火衰微。

清代京城寺庙中,供奉关帝的庙最多,约有四五十座。封建统治者为倡导忠君思想,不断提升关公的地位。清初,关羽被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,从此有关帝之尊称。清中叶,关帝庙按官庙规格,殿宇易盖黄琉璃瓦。随着关羽不断被神圣化,庙宇越建越多,祭祀香火日盛。封建皇权的崩溃,使关帝庙失去政治上的尊崇。

民国初期,袁世凯追求独裁专制,重新抬出旧日的偶像。1914 年北京政府在鼓楼西大街新建一座关岳庙。此庙原为一座清朝亲王祀庙,祠堂里供奉关羽和岳飞的塑像后,改称关岳庙。民间传说

参见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《北京名胜古迹辞典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参见丁守和、劳允兴主编的《北京文化综览》,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。据记载,1929 年调查北京城郊寺庙有 1033 所,其中民庙 364 所,无宗派庙 261 所,有宗派庙 408 所。

岳飞是关羽的转世,因而能精忠报国,故设立此庙。但北京政府的举措,显然缺乏权威性与感召力。此庙香火冷落,难以为继,只得借给大成中学改做校舍。尔后,历届民国政府对中国传统宗教基本上采取抑制性政策。佛教道教的传播事业不断受到冲击,时起时伏,终难挽回日益萎缩的趋势。江南高僧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波及北京,也未能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。1915年10月,北京政府发布《管理寺庙条令》,明令取消中国佛教总会,并规定“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得地方官之许可”,可以占用寺产,住持和尚可“由地方官训诫,或予撤退”。全国性佛教组织的瓦解,使各地侵夺寺产,毁灭佛像之风越来越盛。利用寺庙兴办文教公益事业,成为时代潮流。北京地区许多佛教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。清初所建的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,民国初年香火断绝,于1915年被欧美同学会集资购买,改建为该会活动中心。

二三十年代,京城佛教界兴办各种公益慈善事业颇有成效,推动了宗教的传播。仅1928年,北京佛教寺庙兴办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有果善寺设立第一平民小学,夕照寺设立第二平民小学,拈花寺设立工读学校,净业寺组织贫儿工艺院,嘉兴寺增设贫民纺织厂,永泰寺筹办女子工读学校等。这些济难、赈灾、办学、慈幼性质的公益事业,使佛教深入人心,信徒增多。

随着佛教势力的复兴,有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维修重建。北京三大著名佛教寺庙之一的广济寺,为京城佛教活动的中心。民国以后盛名赓续,扩建院舍,整修殿堂,创立慈佛学院,开设广济平民小学。1921年遭火灾焚毁,其后数年,佛教界陆续集资重建。1936年经广募众缘,重新修复的寺院,更加庄严肃穆,金碧辉煌。

与一度有所复兴的佛教事业相比,道教在京城宗教的上层社会中,衰落较为迅速。北京道教庙观中最著名的白云观,影响力日益衰减,终于失去“全真第一丛林”的地位。全真派是道教两大宗派

之一，亦称内丹派，主要流行于北方。它主张道、儒、释三教合一，修真练气，性命双修，实行出家丛林制度。白云观建筑以八卦方位布局，是全国现存的一座恢宏完整的道教宫观。它接受各地云游来京修道受戒的道士，到民国年间逐渐废止。白云观最后一次传戒仪式于1927年举行，此次受戒道士共计349名。

1928年，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，严格限制道教的活动。京城许多著名的道教宫观香火中断。祀云神的凝和寺、祀雷神的昭显庙等相继被北京教育学会等文教事业机构占用。城隍庙向例于五月初一至初十举行出巡庙会，届时秧歌、高跷等歌舞相随，所经街市，观者如潮。庙期，摊棚林立，热闹非凡。北伐战争后，此举遂废。庙宇亦被警察分驻所借用。崇元观自清末衰败，民国年间庙会绝迹。1931年，国民政府在此庙废墟上建立起陆军大学。

1937年，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，京畿燃起战火。战争震动整个京城，社会秩序失去常态，坛观寺庙也难免劫乱。西郊的妙云寺被协和医院占用，丰台的关帝庙成为县公署的办公地，许多寺庙成为军队的驻地。

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古都北京沦为殖民地。被奴役型的社会结构，严重摧残着民族文化的自主生存。

1939年3月，日伪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决定，将北京政府设立的关岳庙改建为武成王庙，祭祀历代名将。关岳殿被改为武德堂，将精忠报国改为褒扬武德。日伪统治者在北京设坛立庙，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，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传统，遭到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抵制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北京城区免于炮火劫毁，城内许多寺庙仍香火

持续。40年代初,正觉寺、通教寺等少数佛教寺庙被香客捐资重建。然而,郊区战火频繁,许多著名的寺庙毁于战火。庙宇遭焚,佛像被劫,僧侣流散,损失惨重。京城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云居寺,被日军的炮火炸毁,千年古刹成为一片废墟。

到40年代后半叶,政局动荡,民生凋敝,传统宗教更趋衰败。据1948年8月统计,北京城郊尚存有道观寺庙734座,其中佛教寺庙358座,道教观庙209座,民祠小庙(无固定的神职人员)157座。除少数古刹名寺香火延绵外,大多断壁颓垣,荆棘丛生。

二、京城庙会的模式类型

本世纪前半叶,京城庙会的宏观趋势走向衰落,但仍有许多传统庙会颇具吸引力。二三十年代,京城内外循例举办庙会活动的寺庙约有六七十座。

近代京城每月定期轮流开办的庙会约有20座左右,大多地处繁华闹市或交通要衢。每月定期举办的庙会大体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市;一种是以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。

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市,主要有隆福寺、护国寺、白塔寺、火神庙、土地庙,被称为京城五大庙市。这五大庙市自清康熙年间起鼎盛京华,其声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民国时期整个京城的庙会趋向衰落,但隆福寺等庙会的商贸集市功能却日益增强。“昔日以祀神为目的者,今则视为游逛购物之区”。这些寺庙社会存在的经济依托发生重大变化。原寺庙以香客祀神的捐资为主,现转为以收取商摊交纳的地租为主。寺庙主持僧侣为增加收入,不断向当局申

北平市政府编辑:《北平市政统计》,北平市政府1948年8月印行,第48页。
参见北平社会局《北平工商业概况》,1933年印行。

请增加开放日期。隆福寺原庙会会期为农历逢九逢十，每月共 6 天。民国以后，该庙会增加开办日期，改为逢一、二、九、十日，开庙时间增为每月 12 至 13 天。为适应现代商业节奏，各主要庙市相继改用公历。自 1922 年起，护国寺、白塔寺、火神庙花市等庙会会期改用公历。1929 年，京城最大的庙会隆福寺改用公历。这表明，五大庙会自 30 年代起，主观上已将商贸娱乐功能提升为其存在的主要价值。

以民众日常宗教祭祀为主的庙会，有东岳庙、吕祖祠、药王庙、财神庙、报国寺、大觉寺等，大约有 70% 左右为道教系统。这表明虽然道教在社会上层的地位日趋跌落，但在广大市民的宗教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地位。道教系统供奉庞杂浩大的神鬼谱系。世间千般事，皆有神照应。发财、求嗣、祈雨、消灾、去病等一切世俗需求，都有神灵专司其职。普通市民大都无心钻研精深玄妙的宗教哲理，而是迫于实际生活的需求，进香拜佛，与鬼神仙怪勾通。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向神佛索取护佑的功利倾向。世俗气息浓厚的道教很适合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。

近代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约有四五十座。它们或为宗教地位显赫的古刹名寺，或为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。

京城每逢年节定期开办的庙会大致可分为三类：其一，年节喜庆与宗教祭祀相结合；其二，春游踏青与宗教祭祀相结合；其三，行业祭祀祖师的香会。

京城每逢年节喜庆，雍和宫、白云观、大钟寺等著名寺庙都举办盛大的庙会。这些庙会活动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民族文化色彩。民国建立以前，中国社会一直使用农历纪年。每年正月初一元旦为年禧，预兆着天地万物的复苏，是盛大的全民性节日。民国政体确立后，政府颁布法令改用公历，但广大民众仍墨守成规，将农历的春节视为年禧，循例祭神祀祖，求祥祈福，游览寺庙，娱神娱人。此外，

正月十五上元节举办灯会,七月十五中元节举办超度亡灵的法会等,都延续到民国年间。民众对公元元旦的冷淡,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根基。

春游踏青与宗教祭祀相结合在京城历史悠久。阳春佳日,花红柳绿,久居城内的士女云集郊野,借佛游春。位于郊区的卧佛寺、潭柘寺、万寿寺、碧云寺、戒台寺等都修建在山野风景幽胜之地。民众借为神佛进香之机,踏青游览,载歌载舞,娱乐人生。修建在西郊妙峰山等地的碧霞元君祠,每逢春季,朝山之时,“人烟辐辏,车马喧阗。夜间灯火之繁,灿如列宿”,各阶层踏青香客多达数十万,成为二三十年代京城春季规模最为盛大的民众宗教活动。

行业祭祀祖师诞辰的香会源于中国民众尊祖敬宗、崇德报功的多神崇拜。“百工杂技,各崇所宗”。行业神灵的偶像体系庞杂,各行业因地域差异所祭祀的祖师神灵千姿百态。北京的行业祖师崇拜既有一业多神,也有多神一业。关公就是描金业、银钱业、典当业、皮革业、绸缎业、烟草业、制衣业、厨师业、理发业等20个行业的祖师神和保护神。北京银号会馆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从业者对祖师祭祀的义务:“每岁大小祀神共十八次”;“大祭之日,全体执事,齐集拈香”。丰台的花神庙、门头沟的窑神庙等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行业神庙。北京的梨园会馆在精忠庙内兴建了一座天喜宫,供奉唐明皇为戏行祖师。每年三月十八日唐明皇诞辰之日,各戏班名角荟萃,举办募捐义演。每年一次的行业庙会使从业民众找到精神寄托。

富察敦崇:《燕京岁时记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63页。

参见侯杰、范丽珠《中国民众宗教意识》第4章,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。

李乔:《中国行业神崇拜》,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,第56页。

胡春焕、白鹤群:《北京的会馆》,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,第296—297页。

三、庙会集市的商业功能

民国时期,北京庙会集市的商业贸易功能日益增强。二三十年代,京城五大庙会已经形成以商贸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模式。以寺庙为依托的贸易集市,成为城市商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近代北京由封建帝都转为民国首都,城市商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。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模式为主。在民间流通领域中游动销售的小贩占有较大比重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京城家庭手工业不断增加,现代化轻工业生产也渐露头角。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日益增加,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商业贸易需要越来越多的定点市场。除新建的百货商场外,地处交通枢纽的庙会集市成为商业发展的延伸地。

京城具有商贸功能的庙会大体有四类。其一,地处城市要衢的隆福寺、护国寺和白塔寺,其商摊以销售日用百货为主;其二,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庙、花市火神庙,其商摊以销售农副产品为特色;其三,厂甸年节文化庙会,其商摊以经营古玩书画为特色;其四,东岳庙等日常香火庙会,以宗教祈祷为主,附设少量饮食、杂货商摊。

1937年,学者曾对京城主要庙会集市的商摊进行过详细的分类统计(有关资料整理编制统计表请见下页)。

京城各主要庙会集市轮流开办,各有千秋。土地庙每月逢三集市,即:三、十三、二十三日开庙集市,主要经营土特产。花市每月逢四集市,以销售工艺花和鲜花为其特色。这两寺每月集市均为3天。白塔寺庙市期为逢五逢六,护国寺则为逢七逢八。这两寺每月均集市6天,经营的商品既有传统特产,又有新颖百货。此外,白塔寺专设鸟市,护国寺特辟狗市,出售金鱼、鸽、鸟、哈巴狗等,光顾鸟

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庙会集市商摊分类统计表

	隆福寺	护国寺	白塔寺	火神庙	土地庙	厂甸	东岳庙	合计
木材木器	58	50	50	53	43	—	19	273
小型家具	30	37	24	27	55	4	16	193
铁铸厨具	19	13	14	19	17	—	2	84
金属制品	44	24	70	34	58	6	11	247
非机动车	3	—	—	4	1	—	—	8
砖瓦陶器	5	5	17	8	10	3	3	51
医药香粉	50	34	50	19	18	6	15	192
服装鞋帽	249	231	178	150	169	10	9	996
棉布丝绸	39	59	66	14	47	—	—	225
皮革皮鞋	3	3	4	2	4	—	—	16
饮食糖果	164	164	149	77	84	135	35	808
书籍字画	14	9	24	8	3	95	1	154
珠宝玩具	206	58	83	14	49	195	11	616
花草鸟兽	62	25	16	7	25	3	9	147
合计	946	712	745	436	583	457	131	4010

资料来源：王宜昌等编《北平庙会调查》，北平民国学院 1937 年印行。

市狗市的顾客多为有闲之士。京城庙市之首当推隆福寺。该寺逢一、二、九、十开市,每月集市多达12天。集市上既交易珍奇古玩,又销售草药山货,种类繁多,誉满京城。来此观光购物的人,不仅上至达官显贵,下至市民农夫,还有不少外国游客。每逢隆福庙期,游客云集,人流如潮。

根据调查统计,30年代,隆福寺的集市商摊有近千家,护国寺和白塔寺的集市商摊也多达七百余家,每年集市天数分别为72—150天,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。这些庙会集市具有优越的城市地理位置,分别位于京城两大交通枢纽东四和西四。因此京城市民也将隆福寺和护国寺称为东庙和西庙。现代城市的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商业贸易中心。民国时期,东四大街与西四大街的十字路口上,南北两座牌楼的题额均为“大市街”。

厂甸和火神庙的集市以经营文化商品驰名中外。厂甸庙会典型的年节集市。它兴起于清乾隆年间,久盛不衰,延至民国时期。辛亥革命后,该庙会集市日趋庞杂。1918年,北京市政府组织清理整顿,规定每年春节举办大型庙会,会期为15天。每届庙期,南新华街马路中间,彩棚林立,名人字画、书帖金石、珠宝玉器、雕漆珐琅、象牙雕刻、陶瓷古铜等等,风雅华贵,争奇斗艳。毗邻厂甸的火神庙,民国以后,被辟为“文化商场”。平日,博久书局、同善堂、文汇阁等在此地经营书画。春节期间,珠宝商人在此陈列奇珍异宝、金石字画等,与厂甸庙会连成一片,成为古玩书画的展销中心。厂甸文化市场,民国时期格外兴盛,其源于政治格局的急剧变更。清

参见《北平庙会调查》。

胡玉远:《京都胜迹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,第256页。

参见王卓然《北平厂甸春节庙会调查与研究》(1928年),油印本,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藏。

朝覆亡,八旗亲贵及官宦世家日趋破落,被迫变卖家藏。不少军阀新贵纷纷附庸风雅,争购古董珍奇。因此,文玩市场一度出现畸形繁荣。

这些庙会在30年代基本上转变为纯商业性集市。据1937年的调查报告,以商贸娱乐为主的庙会香火已基本断绝。其中隆福寺、护国寺、花市火神庙和厂甸火神庙,进香拜佛已经绝迹。白塔寺有喇嘛为施主设道场诵经,但这种宗教仪式已与庙会无关。土地庙仍有少量香客,多为老年妇女。

都市中心地带的庙会集市有兴有衰。护国寺日渐衰落,而隆福寺日益昌盛。这与城市居民结构及购买力的变化密切相关。清王朝统治时期,西城为皇亲贵族和满族旗人聚居之地。其生活日用品大多采购于庙会集市,因此清代护国寺的庙会十分兴旺。民国建立后,封建帝制崩溃,王公贵族失去权势,满族旗人的国家俸禄也被取消,其经济境遇每况愈下,护国寺的庙会集市便逐渐衰落。而东城居住的外国侨民日见增多,隆福寺又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,商业贸易的需求持续增长,因此该庙会集市日趋发达。

民国时期,京城五大庙市成为城市商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代北京城区的商业中心呈现出南移的趋势。新建的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与前门至天桥一带形成繁华的商业三角区。城区东北和西北缺乏新建的商业贸易中心,隆福寺与护国寺、白塔寺分别衍生为城区东北与西北的商贸枢纽。宣武门外的土地庙成为城乡贸易交流中心。而崇文门外的花市则成为工艺花制造与销售的中心。庙会集市的不断发展,与新建的商店市场共同构成整个城市的商业销售网。

近代京城的庙会集市主要经营中低档商品。集市商摊的货源,除现代化工厂的产品外,都市小手工业及城郊农副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。许多新式大型百货商场不经销的土特产品,都是庙会集市

上的传统商品。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物美价廉,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。有些传统商品也是中上层社会家庭的必备之物。

此外,庙会集市上“讨价还价”的销售方式,十分适应下层社会市民的消费心理。当时,新建的大型百货商场里,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,统一明签标价,一般售货员没有自由浮动价格的权利。顾客主要来自中上层社会家庭。经济比较窘困的下层社会市民不敢到新式百货商场去购物,成为庙会集市上的主要顾客。在集市商摊上,顾客可任意挑选,与商贩漫天侃价,称心如意而归。其实,据商业界人士估算,与新式商场相比,庙会集市的商品价格有高有低,没有明显的低廉优惠。只不过其购物方式更能为下层社会的民众所接受。

在近代京城商业网络中,庙会集市占有持久不衰的重要地位。其销售能力的增长,引起中外商业界的重视。原主要经营农副土特产品的庙会集市上,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。据调查,1935年厂甸春节庙会集市上,在百余家玩具商摊中,有80余家销售日本玩具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外国商品的大举倾销,对中国原有土特商品市场的冲击。

四、民间游艺的繁衍发展

庙会集市是民间游艺繁衍发展的重要天然舞台。依托于庙会的民间游艺有两种形式:其一,庙会集市的剧场杂耍摊;其二,年节民间花会。

近代京城的民间艺人多在天桥一带卖艺栖身。每逢各类大型庙会,他们都纷纷赶往献艺,大显身手。多姿多彩的民间游艺,洋溢

着浓厚的地方风韵, 饱含着质朴的生活气息。五彩缤纷的民间艺术, 京韵十足, 深受京都市民喜爱。这种商业性市民娱乐活动, 其场所分为两类: 戏曲剧场与杂技摊场。戏曲剧场开办在位于繁华闹市的隆福寺、护国寺、白塔寺等寺庙。30年代中叶, 隆福、护国、白塔三寺共开辟简易剧场约20余所。其中以曲艺、京剧、评剧等艺术演出为主, 有时也放映早期电影片。虽然庙会剧场不时有落泊的京剧、评剧艺人登台表演, 但是真正体现民间文艺色彩的是曲艺。大鼓、单弦艺术不断推陈出新, 评书、相声演技日臻成熟。白塔寺庙会专门开设大鼓剧场。许多民间艺人长期在此登台演唱。其中乐亭大鼓艺人傅士亭、梨花大鼓艺人侯五德, 嗓音宽亮, 溶说于唱, 声情并茂, 常常使观众留连忘返。

杂技摊场开办于护国寺、土地庙、厂甸海王村等地。30年代中叶, 护国寺、土地庙、海王村三地共开辟杂技摊场约30余处。

皮影戏、傀儡戏、拉洋片等杂戏摊场, 是以观赏为主的表演杂艺。民国年间, 京城的皮影戏艺人多来自河北滦州。傀儡戏起初由一人独演, 后来发展为数人合作的木偶戏。拉洋片又称西洋镜, 即将照片或自制图片, 放置特制的木箱内, 让观众通过凸透镜观看。艺人一边拉动长片, 一边敲着锣鼓, 演说伴唱。这种简易活动影片, 在二三十年代的京城盛行一时, 拥有众多的市民观众。其后, 随着现代电影业的兴起, 拉洋片逐渐衰落, 终于成为历史陈迹。

戏法、踢键子、耍坛子、猴戏等杂技摊场, 是民俗性格鲜明的娱乐活动。当时京城耍猴戏的艺人多来自河北深县、易县等地。中国古典戏法与现代魔术不尽相同, 艺人在人群中间表演, 手脚的灵巧, 技术的娴熟, 令人大饱眼福。踢键子、耍坛子等起源于民间的杂耍, 后经不断发展创新, 已步入正式竞技舞台。

武术, 民国年间北京地区俗称练把式。各类庙会均有练武的专场。当时, 练大刀、拉硬弓的张宝忠、练拳脚的白光汉均名扬武坛。

练花剑的女将栾秀云更是蜚声京城。

花会,亦称走会,是娱神与自娱相结合的大型民众游乐活动,它不但带有宗教色彩,而且具有非商业赢利性质。每逢年节庙会,民间艺人汇集街头,即兴表演,节目有飞叉、五虎棍、中幡、跨鼓、高跷、秧歌、杠箱、杠子、石锁、坛子、小车、跑驴、旱船、龙灯、狮子等数十种。这些歌舞游艺,不仅形式多样,技艺高超,而且具有戏剧情节,引人入胜。届时,各路民间艺人荟萃街巷,载歌载舞,观众如潮,万人空巷。

春游朝顶走会,是京郊规模盛大的献艺酬神活动。每年春季,京郊金顶妙峰山、丫髻山等地相继举办祭祀碧霞元君的朝圣庙会。届时,京城至名胜百余里途中,成千上万的香客络绎不绝。朝圣的各种民间香会中,有许多杂技歌舞花会,如:鞍子巷的开路飞叉、罗家园的五虎少林棍、白纸坊的大鼓、官庄的秧歌、缸瓦市的杠子、排子胡同的双石头、“五城弟子”的清音、方砖厂的狮子等等。这些献艺的香会沿途边走边演,鼓乐齐鸣,数十万春游的香客民众竞相观赏。朝顶走会成为近代京城最重要的民间花会之一。

民国时期,北京地区庙会上的民间游艺活动多姿多彩,十分兴盛。其艺术观赏价值日趋上升。如: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,原在白塔寺庙会上辟场演唱,后来技艺日臻精湛,赴天津书场登台献艺,名扬京津。再如:拉洋片本是地道的民间杂艺。老艺人焦金池自制图片,自编自演,声情并茂,后常被邀请至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演出“西洋镜”。民间俗文化的社会地位呈现明显上升的势头。

参见王铭《北京的民间走会》,《北京史苑》第4辑,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,第272—284页。

参见顾颉刚编《妙峰山》,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8年版。

王隐菊、田光远、金应元:《旧都三百六十行》,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,第169页。

这种趋势反映出都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兴。然而,下层俗文化的升级,显然受到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新文学大潮的影响。

五、宗教祭祀的衰弱变异

近代北京地区政权统治力的衰弱,导致官府倡导力下降。现代化社会经济因素增长的缓慢,使现代意识形态向全社会各阶层,特别是向下层社会的渗透力相当微弱。北京民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,无论家族人伦理性,还是包容性格与多神信仰,都使民众的宗教祭祀更趋于实用与功利化。

民国时期,传统的岁时庆祝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力。年禧春节和中元节仍举办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。然而,这一时期京城年节的宗教祭祀庙会日趋世俗化。

政治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显赫因素。它的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更为鲜明。清朝帝制崩溃后,以清廷皇权为依托的宗教典仪,立即呈现出江河日下的态势。雍和宫原为清廷管理藏传佛教——喇嘛教的中枢。每年农历正月三十前后,都举行善愿日法会,跳布札,送祟除邪,北京地区俗称“打鬼”,循例为庙会期。雍和宫跳布札的仪式,由清朝皇帝主持,王公大臣云集,盛冠京华。清帝逊位后,由蒙藏院主持,仪式逐年从简,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,一时竟超过往昔。

京城寺庙的春节庙会中,许多节庆项目逐渐褪去宗教色彩,成为趣味性民俗活动。例如,每逢春节年禧,道教的白云观、佛教的大钟寺等著名寺庙均有打金钱眼的习俗。庙会期间,香客以硬币投打

参见魏开肇《雍和宫漫录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6—19页。

这种趋势反映出都市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兴。然而,下层俗文化的升级,显然受到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新文学大潮的影响。

五、宗教祭祀的衰弱变异

近代北京地区政权统治力的衰弱,导致官府倡导力下降。现代化社会经济因素增长的缓慢,使现代意识形态向全社会各阶层,特别是向下层社会的渗透力相当微弱。北京民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传统的自发趋势,无论家族人伦理性,还是包容性格与多神信仰,都使民众的宗教祭祀更趋于实用与功利化。

民国时期,传统的岁时庆祝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力。年禧春节和中元节仍举办盛大的宗教祭祀活动。然而,这一时期京城年节的宗教祭祀庙会日趋世俗化。

政治是影响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显赫因素。它的影响力在国都京畿更为鲜明。清朝帝制崩溃后,以清廷皇权为依托的宗教典仪,立即呈现出江河日下的态势。雍和宫原为清廷管理藏传佛教——喇嘛教的中枢。每年农历正月三十前后,都举行善愿日法会,跳布札,送祟除邪,北京地区俗称“打鬼”,循例为庙会期。雍和宫跳布札的仪式,由清朝皇帝主持,王公大臣云集,盛冠京华。清帝逊位后,由蒙藏院主持,仪式逐年从简,但慕名前来观光的中外游客云集,一时竟超过往昔。

京城寺庙的春节庙会中,许多节庆项目逐渐褪去宗教色彩,成为趣味性民俗活动。例如,每逢春节年禧,道教的白云观、佛教的大钟寺等著名寺庙均有打金钱眼的习俗。庙会期间,香客以硬币投打

参见魏开肇《雍和宫漫录》,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6—19页。